

改革开放初期粤语流行语的国家认同建构

杨子涵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 粤语流行语作为经济转型与文化重构的产物, 成为观察国家认同建构的独特窗口。本文以语言学与文化符号学为理论框架, 通过分析《啼笑因缘》电视剧主题曲传播、广州音乐茶座文化、“头啖汤”“搞掂”等词汇的流变等典型案例, 揭示粤语流行语如何通过三重机制参与国家认同建构。

关键词: 粤语流行语、经济转型、词汇流变、国家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代), 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与文化生态重构催生了独特的语言现象。粤语流行语作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 既承载着岭南文化的地域基因, 又通过市场化浪潮与大众传媒的催化, 演变为全国性的语言景观。从《啼笑因缘》电视剧主题曲的粤语旋律风靡内地, 到“头啖汤”“搞掂”等词汇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口头禅, 粤语流行语的传播轨迹折射出市场经济转型期国家认同建构的复杂面向。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 更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热”与“经济热”的双重语境下, 粤语流行语通过三重互动机制参与国家认同建构: 其一, 作为经济改革的隐喻符号, “头啖汤”(先行先试)将个体经济活力编码为民族复兴的集体叙事; 其二, 作为文化资本的流动媒介, 粤语歌曲与影视作品通过商业化的传播路径, 将港澳地区的现代性想象注入内地社会意识; 其三, 作为身份协商的柔性工具, 内地民众对粤语词汇的模仿与转化, 既是对市场经济效率观的认同, 也是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这种语言现象与政治认同的交织, 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认同政治的重要切口。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粤语的语言本体特征(如九声六调、古汉语遗存), 或停留于文化传播现象的描述(如粤语歌曲的北上路径), 而缺乏对语言实践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透视。本研究引入语言政治学与文化符号学交叉视角,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粤语流行语的生成机制、传播网络与接受效应, 揭示语言符号如何被纳入国家认同的建构体系。这一研究不仅可深化对语言与社会转型关系的理解, 亦可为新时代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历史镜鉴。

二、历史语境中语言生态与经济变革的耦合

1. 粤语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基因

粤语的形成可追溯至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 中原移民与百越族群的语言交融催生了最早的粤语雏形。至唐宋时期, 粤语已形成独立方言体系, 其声调系统保留了中古汉语

的九声六调特征，词汇中存留大量古汉语成分，如“睇”（看）、“企”（站）等。明清时期，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粤语吸收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外来词，奠定了其开放包容的语言特质。

鸦片战争后，粤语进一步融入西方语言元素。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语词汇如“摩登”（modern）、“巴士”（bus）通过殖民行政体系进入粤语。至20世纪中叶，粤语已形成“三文四语”（中英文、粤语、英语、葡语）的混合特征，成为华南地区跨国贸易的核心媒介。

2. 改革开放前的语言政策与方言生态

1949年后，国家推行“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政策，粤语在官方语境中被定位为“方言”，其传播受到严格限制。1956年《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将北方方言作为普通话基础，粤语在教育、媒体等公共领域逐渐边缘化。然而，珠三角地区因毗邻港澳，民间粤语使用始终活跃。1970年代广州高第街个体户的兴起，使“学生餐”“埋单”等粤语词汇通过市井经济活动悄然传播，形成语言生态的隐性抵抗。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呈现出“中心—边缘”的张力：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强化普通话的权威性，而粤语则通过地下出版物（如手抄本歌曲集）和跨境商贸维系生命力。例如，1974年TVB电视剧《啼笑因缘》的粤语主题曲虽遭禁播，但仍通过走私录音带在珠三角流传，形成独特的“声音游击战”。

3. 经济改革与语言生态的裂变

1978年改革开放后，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引发人口流动与资本集聚。1980年代广州东方宾馆音乐茶座的开业，标志着粤语流行文化进入公共空间。1974年TVB剧集《啼笑因缘》的粤语主题曲通过地下渠道传入内地，其旋律与歌词中“人生如戏”的喟叹，暗合了民众对个体价值的重新发现。这一时期，粤语从市井方言蜕变为文化资本，其传播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共振：1982年“万元户”概念的提出，催生了“头啖汤”（先行者）等粤语新词，将经济改革话语编码为地域文化符号。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催生了语言混杂现象。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外资企业中，粤语与英语、普通话形成“三语共存”格局：“搞掂”（解决问题）与“OK”并置使用，“T恤”（T-shirt）等音译词成为职场通用语。这种语言实践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早期形态，更暗示了粤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转型。1980年代，随着广东电视台、无线电视（TVB）等传播机构的兴起，粤语节目《天天星期天》《欢乐今宵》《男亲女爱》等深受观众欢迎。粤语流行语如“有问题”、“劲正”、“发喻风”等不仅展现出岭南地区的生活态度，也在消费主义、个人表达与身份建构中扮演着语言标识的角色。

这类语言形式往往带有轻松、调侃、幽默、反权威的特征，与国家宣传语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一种“边缘话语”。但国家并未压制这种地方表达，而是通过文化政策、媒体制度与话语调控，将粤语流行文化逐步纳入“主旋律”叙事之中，使其成为“多元一体”国家认同架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流行语中的国家认同建构机制

粤语流行语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体现为经济话语转译、文化符号编码与身份协商的三重互动机制。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与粤语俗语“搞掂”（解决问题）形成互文，将效率至上的改革精神融入日常语言。这种转译策略使政策话语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冰冷感，通过生活化表达获得民众认同。

粤语流行语的兴起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快速增长的经济活力为粤语文化的扩展提供了现实土壤。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互动也在此时期达到高潮，电视节目、电影、流行音乐通过录像带、广播与港商渠道大规模涌入珠三角地区，粤语逐步成为一种“文化时尚”的象征。

这种传播并非自发，而是在国家“引进先进文化、发展特色文化”的指导原则下得以半制度化推动。例如，中央批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引进港澳电视节目，并设立“对港宣传窗口”，本质上是“以文化促认同”的战略布局。粤语在国家开放战略中被赋予“文化通道”功能，其语言形态、流行词汇因此具有了象征性的政治意义。

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编码则体现在粤语歌曲的叙事策略中。1984年张明敏在央视春晚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其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通过粤语声腔传递家国情怀，成功消解了港台文化与内地主流价值的区隔。这种音乐政治学实践，使粤语从地域方言升华为民族情感的载体。同期谭咏麟的《爱情陷阱》等歌曲，虽以情爱为主题，但其旋律中融入的岭南小调元素，无形中强化了文化归属感。

身份协商机制在语言接触中尤为显著。1980年代广州高第街的个体户群体，既使用“埋单”（结账）等粤语词汇进行商业活动，又在正式场合切换普通话以彰显政治正确。这种双语实践折射出市场经济主体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身份游移。港澳同胞赴内地投资时，通过“饮啖汤”（喝口汤）等方言要求，既是对饮食习俗的坚持，也暗含对文化特权的确认。1990年代广交会上，港澳客商用“搞掂”与内地商人交易，粤语成为跨越制度差异的经济纽带，其语言实践实质是“一国两制”在微观层面的柔性实践。

四、语言政治与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

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审视，粤语流行语的传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规训的柔性实践。1986年《人民日报》刊文肯定“万元户”的致富意义，其标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被改编为粤语顺口溜“先饮头啖汤，后饮第二啖”，这种民间话语对官方叙事的再诠释，既稀释了政策敏感，又强化了改革共识。

粤语中“士多啤梨”（strawberry）、“巴士”（bus）等英语借词，表面是语言污染，实则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认同的流动性。1990年代广州年轻人用“的士”（taxi）指代出

租车，其发音与粤语“的士”（弟弟）相近，形成语义双关，这种语言游戏实质是后殖民语境下身份认同的策略性表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被粤语区演绎为“搞掂就是硬道理”，政治话语与市井智慧的嫁接，创造出独特的政治合法性话语体系。

这种语言政治的辩证法在影视作品中尤为突出。1987年电影《胭脂扣》通过粤语对白构建的怀旧叙事，既是对殖民历史的诗意解构，又通过“如花”等角色塑造强化了文化认同。影片中“十二少”说的“我哋一齐走啦”（我们一块走吧），在粤语语境中传递的不仅是爱情承诺，更隐喻着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1980年代香港电视剧《上海滩》在内地热播，其粤语对白中的“浪奔浪流”被普通话观众接受为时代精神符号。这种跨语言的文化翻译，既实现了香港现代性想象的北上传播，又通过语言转换消解了文化差异，印证了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中文化杂交的创造性。

五、语言认同的当代启示

（一）文化合法性的建构

1. 改革叙事的粤语转译

“头啖汤”“生猛”等词汇将市场经济活力编码为民族复兴叙事。1990年代广州出现的“炒更”（兼职）现象，其对应粤语词汇的流行，既反映了经济活力，又将个体经济行为纳入“勤劳致富”的主流话语，完成了市场逻辑的意识形态包装。

2. 文化软实力的输出

粤语流行歌曲、电影通过文化产品输出价值观。1991年Beyond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在非洲多国引发共鸣，其歌词中“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超越了地域局限，使粤语成为全球华人的文化纽带，彰显了语言作为软实力的独特价值。

（二）政策与文化的冲突

1. 标准化与多样性的悖论

1999年广州某中学禁止粤语广播的事件，暴露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与地方文化保护的矛盾。这种冲突在数字时代愈发尖锐：当“蓝瘦香菇”（难受想哭）等网络粤语梗风靡全网时，其娱乐化消解了严肃话语，也使语言认同面临碎片化风险。

2. 全球化冲击下的身份焦虑

1990年代后期，随着英语教育普及，部分粤语区青少年出现“粤语失语”现象。广州某小学调查发现，70%学生更倾向使用普通话，粤语沦为家庭私域语言。这种代际断裂威胁着方言文化的代际传承，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本土认同的脆弱性。

粤语流行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已不仅限于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区域文化现象，而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语言、权力与认同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启示，尤其是在多民族、多语种并存的当代中国语境中，其经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认同塑造的角度看,语言是国家想象的基础性资源。粤语流行语的整合表明,国家认同并非一元、静态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一个多元话语不断协商、融合并被制度化表达的动态机制。方言、地方语汇、亚文化用语等一旦被纳入主流语境,不仅不会削弱国家认同,反而能够增强其真实感与凝聚力。从语言治理的角度出发,粤语经验提示我们,有效的语言政策并非单一推广普通话,而是“主次分明、多语共荣”。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在保障普通话通用性的同时保护地方语言的文化遗产与情感归属,成为当前语言政策面临的新命题。粤语的经验显示,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协同”而非“对立”。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而言,今天的网络语境下,“流行语”不再受限于地方传播,而是迅速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华语语境中的话语资源。方言、俚语、网络黑话等的兴起,重新激发了地方文化的表达欲望与身份认同的再组织。如何在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语言洪流中建立新的“语言共同体”认同,是未来值得持续探索的问题

六、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的粤语流行语,既是经济转型的晴雨表,也是国家认同建构的试验场。通过将市场逻辑编码为“头啖汤”等文化符号,粤语成功弥合了地域差异;借助影视音乐的情感动员,方言完成了从市井话语到意识形态载体的蜕变。这种语言实践揭示:认同建构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在话语博弈中达成的动态共识。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粤语现象提示我们:语言政策既要守护文化根脉,更需为多元认同提供制度性包容空间。当前数字技术催生的方言短视频、网络流行语等现象,正在重塑语言认同的形态。研究者需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审视语言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守护语言多样性的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粤语流行语作为语言实践的结晶,不仅反映了一个区域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活力,更在国家语言政策与主流话语体系中找到了协商的位置。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粤语文化的吸纳与重构,是一种典型的“差异中的整合”策略,既保留地方文化的活力,又将其转化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因此,粤语流行语不仅是地方认同的标识,更在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桥梁”角色,体现了语言如何成为政治整合与文化协商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 [1] 粤语[J]. 伍巍. 方言, 2007.
- [2] 从汉语外来新词研究看文化策略的变迁[J]. 许文胜. 安徽大学学报, 2006.
- [3] 汉语外来词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文化性浅析[J]. 王彦锐. 陕西经贸学院学报, 2002.
- [4] 试析广州话中的英语外来词[J]. 吴慧坚.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1997.
- [5] 广东改革开放启示录[M].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 人民出版社, 1993.
- [6] 当代视角下岭南文化遗产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王晓辉. 文化学刊, 2025.

Nation-Building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Early Reform-Era Cantonese Popular Discourse

Yang Zih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antonese popular expressions, as product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became a unique lens for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adopts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emiotic framework and analyzes representative cases, includ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heme song of the TV series *Tidiao Yinyuan*, Guangzhou's music teahouse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expressions such as "tóu dān tāng" and "gáau dim", to reveal how Cantonese popular expression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ree intertwined mechanisms.

Keywords: Cantonese popular expressio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xical evolutio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